

教宗在利瑪竇進京四百週年紀念致詞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編者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紀念利瑪竇神父抵達北京的四百週年研討會上致詞，反省四百多年來傳教士在中國服務的意義及局限。以下為講話全的中譯本，特此刊出與讀者分享。）

1. 尊敬的女士及先生們，我十分高興，在這為紀念偉大的意大利傳教士、學者、科學家、傑出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來到北京四百週年而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上，同你們講話。我特別向發起並組織這次會議的宗座額我略大學校長和意中協會負責人致意。我熱烈歡迎出席會議的學者們，尤其高興見到來自利瑪竇神父第二祖國——



——中國的學者們。我知道，你們這次羅馬會議，與幾天前（十月十四至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個重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有若干聯繫。那次會議的主題是「相遇和對話」，主要涉及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同時也注意到利瑪竇神父在中國無與倫比的成就。

2. 今天的會晤，把我們的思維和心神都帶到北京這現代中國的偉大首都、利瑪竇時代的王朝京師。經過二十一年苦心孤詣鑽研中國語言、歷史和文化之後，利瑪竇神父於一六零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進入這皇帝居住的地方。他受到體面的待遇，知識界和政界人士重視他，相繼拜訪他，更有人向他請教他所擅長的科技知識。這樣，他在北京度過他的餘生，一六一零年五月十一日去世，享年五十七歲，其中二十八年生活在中國。我尚欣然記起：當利瑪竇剛到北京時，他曾向萬曆皇帝呈上奏章，說自己是出家修道的人，不求朝廷任何特殊待遇，只希望能以他的才能和在「泰西」故鄉所獲得的知識

為皇帝陛下效勞。皇帝當時的積極回應，給在現代中國的天主教來說，有更深遠的意義和重要性。四個世紀以來，中國極其尊重利瑪竇為「西泰子」，這是人們對利瑪竇神父的尊稱。作為先驅者，利瑪竇是歷史和文化上的一個樞紐，他把中國和西方、悠久的中國文明和西方世界連接起來。我曾在「利瑪竇到中國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向與會者深信不疑地指出，利瑪竇神父在「福音本色化」工程上有其特殊的貢獻。他把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譯成中國語言，締造了中國人認識天主的條件，並為福音喜訊和教會「在中國文化土壤的植根」開闢了園地。依「漢學家」一詞在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說來，利瑪竇神父「做了中國人當中的中國人」，做到真正的「漢學家」的地步，因為他把司鐸和學者、天主教徒和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等等如此不同的身份，出奇地融合在他一人身上了。

3. 利瑪竇神父與偉大的中國及天主教結有

深厚的感情，同時也受著這兩者的真心愛戴。在距離他到達北京之後四百年的今天，我們不禁要問，他給中國和天主教留下甚麼贈言，甚麼教益。利瑪竇神父的經驗，所以至今依然新穎而有現實意義，其原因之一，是他從起初便對中國的全部歷史、文明和傳統懷有深厚的感情。一五九五年在南昌出版後立即博得普遍讚賞的《交友論》，以及在中國二十八年生涯中耐心的廣泛結交，便是他對中國人民忠心、誠實和友愛的確實證據。這樣崇高的心情和態度來自他在中國文化研究上的造詣，他能用中國文字向中國學者闡述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出新的解釋。此外，利瑪竇神父與中國人初次接觸，便將自己教授科學和傳揚福音的全部計劃建立在兩根支柱上，後來雖然經歷種種內外的阻擾和不瞭解，始終不曾變更。這兩根支柱便是：第一，新奉天主教的中國人，絕無必要減輕其對祖國的忠誠；第二，接受天主教有關天主奧蹟的啓示，並不排斥中國古代傳統所直覺並傳授的真、善、美、

聖，反而將它們提高到更有價值和更爲完滿的地步。具備這種心得，利瑪竇神父明白要像幾世紀前教父們在基督福音與希臘羅馬文化交接中所作那樣，去推行「將基督信仰植根於中國」的高瞻遠矚的計劃，耐心地與這偉大民族的知識分子共同謀求一致的立場。

4. 中國人民，尤在是近年來，在社會發展方面爲自己定下重要的目標。天主教會讚賞這驚人的希圖和勇敢的創新設計，願意在推進和維護人權、人的價值、人的精神、人的超自然使命等各方面，提供深思熟慮的貢獻。教會最關心的，也是對現代中國最爲重要的那些價值和目標，就是社會正義、團結互助、和平、對全球化現象的明智處理，以及所有民族的文明進步。正如利瑪竇神父於生命的最後兩年間在北京所編寫的《中國札記》這部爲外國人認識中國的先鋒和基本著作時所說，今日的天主教也不向中國和中國政府請求任何特殊待遇，它的唯一願望是恢復對話，達到一個以互相尊重及

彼此深入認識爲基礎的關係。

5. 以這位天主教會的卓越兒子爲榜樣，我願意重申聖座懷著深厚同情和切身關懷看待中國人民。衆所周知，過去，天主教會不惜犧牲在社會、經濟和教育領域上有過卓越的表現。今天，它仍有決心，再次爲中國天主教徒和所有這國家的人民的福利，提供謙虛而無私的服務。關於這一點，我不得不提起，幾世紀以來，許多慷慨的男女傳教士在傳播福音和推進社會福利上完成的偉大工作：他們領先創立許多重要的社會福利機構，特別是最受中國人民大眾歡迎的醫院和學校。

可惜，歷史告訴我們，教會成員在中國的行爲並非絕無過失，這是人的本性及其行爲有限的自然苦果，也是受到因複雜的歷史事件以及彼此衝突的政治利益糾纏而造成的惡劣環境的難免影響。更有甚者，神學上亦出現紛爭，激怒人心，更爲福傳工作帶來重大的麻煩。在近代歷史的某些階段會出現一種依仗歐洲列強勢力的「保教權」，雖然從一

方面說來，這會多少有助於教會的傳教活動，但結果畢竟限制了教會的行動自由，損害了教會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像，因此不期而然地阻礙了教會在中國的進展，使教會不能爲中國人民的好處，一心一意地執行其創立者耶穌基督所賦予的使命。爲這些過去的過錯和缺陷，我深感惋惜。我很遺憾，這些不幸的事情在人們心裡造成了天主教對中國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視的印象，以至他們相信天主教對中國懷有敵意。因爲這一切，我向所有自覺會被天主教徒這類行爲所傷害的人們，請求寬恕和原諒。教會不應該怕懼歷史的真理，雖然內心痛苦，也要爲它的兒女們的過失擔負責任，這也包括它對中國人民過去和近來的關係在內。但是歷史真理的追求，必須心平氣和、不偏不倚、完面徹底。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應該由學者們去進行。諸位瞭解中國情況，請也參與，提出貢獻。我保證，聖座常準備在這研究工作上與大家合作。

6. 利瑪竇神父寫在他的《交友論》開端的

那幾句話，到今日，變得很適切和合用。他將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和天主教作者們對友誼反省的結果帶到第十六世紀的中國文明當中，他把友誼定義爲「我之半，乃第二我也」，又認爲「相須相佑，爲結友之由。」

懷著對全體中國人民不斷更新並且日益增強的友誼，我熱切渴望聖座和中國人民共和國之間交流和合作的具體途徑能早日實現。友誼因著接觸、分享不同境況中的喜樂和痛苦及團結互助而得以滋養。宗座誠心追求做所有民族的朋友，與全球每一位善心人士合作。中國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確不相同，但絕非彼此對立。它們是今日世上歷史最悠久的兩個「機構」。他們的性質雖有異——一個是政治的，屬於現實社會的；另一個是宗教的，屬於精神方面的——兩者卻都擁有十億的兒女。毋庸諱言，聖座以普世天主教會的名義——我相信——也爲了全體人類的好處，祝望開闢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的空間，希望能藉此克服過去的誤解，進

而爲中國人民的福利並爲世界的和平，攜手合作。今日國際團體極其不安的時刻，要求所有的人共同努力，一起建立及發展民族之間的同情、友好和團結關係。在這樣的形勢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聖座之間關係的正常化無疑會對人類的前途帶來積極的影響。

7. 容我再一次在爲這重大歷史事件而舉辦的適時的慶典上表達我的喜悅。我祝願並祈求天主，願利瑪竇神父在東方和西方、基督宗教和中國文化之間所開闢的道路，能引領我們不斷發現新的途徑，推進對話和增進彼此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豐盛。說完這些祝願之後，我樂意分給你們各位——在天主面前有說情功效的——宗座祝福：願天主賜給你們喜樂與幸福。

若望保祿二世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於梵蒂岡